

# 我的父亲龚饮冰<sup>\*</sup>

## 龚育之

曾涛（北京电视台主持人，以下简称曾）：在前面的谈话中，您两次提到您的父亲。我们了解到，他是中国共产党非常有名的、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工作者。您是什么时候知道您父亲真实身份的呢？

龚育之（以下简称龚）：我父亲1923年入党，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做地下党工作。他是与中央联系、受地方支持，也与上层有点沟通，但不是在基层做群众工作的地下党员。因为我的母亲去世了，父亲做地下党，不但有风险，而且奔波，带着我不方便，就把我寄养到湖南我姨母家，所以我不在他身边。他常年在外，在上海，在重庆等地。到1947年，我听说他生病了，吐血，多年没有见到他了。那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了，我去看他，这时他谈到个人一些情况，也了解我的一些情况，我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当时的政治倾向。

曾：在那以前你们没有见过吗？

龚：抗战八年，中间父亲回湖南看过我一次。那时我正在学校上学，回来见过一面，他就走了。直到抗战胜利没有见到他。后来听说他生病吐血了，就去看他。他知道了我那时候的政治态度倾向于进步，我当然不隐瞒他。闻一多、李公朴被暗杀，气氛一时紧张，共产党与国民党谈，国民党总不愿意和平，都气愤啊。一直到国民党打下张家口，我在上海给同学写信，落款是“写于张家口陷落的那一天”。他知道我的态度比较进步，也就向我暗示了他的政治身份。

父亲说了什么情况呢？他知道我的政治态度，也担心我参加学生运动遭到不测。说你要参加学生运动，我们当然不反对，但你与别人

不同，别人如果被捕了，他家里可以出面担保把他保出来，我的情况就不能那样做。他的意思是他还要做地下工作，反而不能做什么。虽然父亲没有明确告诉我这一点，但是我明白这个意思。到1948年，我高中毕业，准备考大学，就到上海住到他家里。这样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。那时，他担任一家私人银行——建业银行的总经理，这个身份对做地下工作、联络非常重要。但是，恰恰那时不久，他那个系统的一个地下党员被捕了。这个人可能非常坚定，也可能供出什么来；供出什么来，就可能牵连他。所以当时组织上把他撤退到香港去，但是也不能轻易放弃这个地方。刚好我到那个地方去了，我还有一个姐姐在那儿念高中，要毕业了，要考大学，也在上海考。所以父母（继母）两个人到了香港，但是他表示他还在这个地方，儿子、女儿还住这儿。等我们在上海考完大学，他们那时也决定不回上海了，才让我们到香港去，这才把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告诉我们，而且告诉我们他们要准备进解放区了。

曾：您第一次知道父亲的身份时，是一种什么感受呢？

龚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，当然知道了这个底细。原来我住在姨母家，姨母知道他在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，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是半公开的。后来他做地下工作，就装成一个商人，后来当了银行总经理。他们可能也不会认为他是共产党，以为他与革命脱离关系了。我从我姨母那里知道这些事情，后来才知道他还是做地

<sup>\*</sup> 本文为作者2006年3月17日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的记录整理稿摘录，经家属同意后发表。标题为整理者所拟——编者注。

下党工作，所以我也没有感到什么特别的意外。

在香港这个环境可以看很多毛泽东的著作，那时还特别看到一个东西，当时看不懂。他们这些地下党员到了香港，香港是共产党相当活跃的地方，他们一起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去的一位领导补课整风学习，学习毛泽东主持起草的《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那本决议没有印刷，可他们都要学习，就让我们把历史决议一部分一部分地复写。让我复写，当然是信任我的，知道我不会怎么样。这样，我就半懂不懂地看到党的历史的一些东西。这是在香港。后来才到北平上清华大学。

曾：您父亲在上海做了相当长时间的地下党，是不是与周恩来有很多往来？

龚：他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，但不参加上海地区的地下党组织，而负责与中央、延安，与周恩来联系，所以他是地下党里的特别党员。担负的任务是与中央联系，有情况向中央报告，有什么重要的任务由周恩来指派给他。他与地下党也有一点联系。那时，后来当总工会副主席的刘长胜等人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，与我父亲有点联系，但我父亲不是编到上海地下党组织里面去的。刘少文，中央社会部的一位副部长，那时候在上海，也与我父亲联系。那个地方出了问题，有一个人被抓了，刘少文从窗户上跳下来逃走了。这样，怕被抓的人供出来，我父亲才到了香港。

曾：后来周恩来是否知道您与您父亲的关系呢？

龚：周恩来是否知道，我不太清楚。我想，我父亲与周恩来当然总见面，但是不会提到他有个儿子如何如何。我也没有事情找他，我与周恩来极少这种面对面的关系。我父亲是否与他讲过，我也不知道。

曾：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过，您父亲曾经和邓小平一起参加过百色起义。后来您与邓小平有过那么多接触，邓小平是否知道您与您父亲这样一种关系呢？

龚：我不知道。邓小平到广西去，要组织起义。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党中央，被派去和邓

小平一起去，这是后来我父亲告诉我的。他负责邓小平与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的联系，或者亲自跑回来，或者通过什么关系，这些我知道。后来，我父亲被派回到上海，中央又决定他回去，邓小平又派他回上海中央去，再后来中央就没有让他再回去了。所以我父亲说：很可惜，如果那次他继续在邓小平那儿工作的话，大概就会参加开辟根据地，到根据地去了。可是中央让他回来，他就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了。这些，我父亲说过，我也知道。

邓小平后来负的责任很大了，我父亲当然与他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，但也不会有太多私人的交往。我父亲后来身体不好，处于养病状态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父亲病了，中间疏散到外地，回到北京，住在北京医院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邓小平重新担负工作，主持中央工作。邓有一次到北京医院，有人告诉他：龚饮冰住在这里。他说：那我去看一看。他看了看我父亲。因为他们从前就有相当密切的联系，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在轻工业部、统战部负责任，与他有工作关系。他去看我父亲，这是表示老战友的一种关切。

“批邓”之后，到1975年底，我父亲不住医院了，回到家里，很关心邓小平的命运。我那时候还在工作，他总从我这里打听，问最近形势怎么样。开头知道毛泽东批评邓，但毛泽东还是说让邓管外事。当时我心里想：就是不让他管全面，管一方面，管外事也是很重要的。我告诉父亲说：不会打倒邓，还让他管外事呢。我记得那时还看到一个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或者什么人的谈话，对方表示邀请毛泽东去。那时候“批邓”已经开始了，毛泽东说：我年纪大了，不行了，指着邓小平说，你们请他去吧！这给我的印象是：虽然已经批邓了，但并不是要打倒，还是让他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，甚至毛泽东自己不出国，还要外国人请邓去。我总是不断把这些认为是好的消息告诉我父亲，我父亲也比较欣慰吧。但是，到了天安门事件，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，保留党籍，以观后效。清明节前后，我父亲住在北京医院，我去看他，

从西城经过天安门再到医院，就看到当时天安门广场群众的悼念活动，我心里也想哭啊。那时候，父亲说话，就不提邓小平的名字，因为邓小平已经被撤消一切职务，处于被打倒的地位，他就用“大耳朵”指代。“邓”字右边是一个耳朵，简写之后“又”很小，“耳”很大。他就问：“大耳朵”又怎么样了。我不断告诉他情况，虽然我也不知道详细情况。父亲始终关心着邓小平的命运，这当然有他同邓小平个人关系的原因。但是，我想，更多的是对国家、对党会走到哪里去的关心。

我父亲是那年6月，也就是“批邓”高潮的时候去世的。我父亲坚持到1976年6月，没有坚持到10月，还差3个来月，没有能看到粉碎“四人帮”。我想，这对他应该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。父亲去世之后，因为他过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，给他开了追悼会，大概是7月开的，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致悼词。悼词讲他的经历，当时还讲了一段“批邓”的套话，还说这个人怎么支持“批邓”等等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种情况下，悼词讲这些套话，我们无话可说。我父亲的骨灰要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大概放在第一室，就是领导人室。领导人室，除了摆骨灰盒之外，还有一个罩子，罩子上要刻上悼词。我那时候虽然觉悟不高，但是对那么“批邓”实在反感。可是中央组织部作的悼词，我能修改吗？这很麻烦。去请示，人家肯定不让你修改。我说：这反正是我们家里的事，我父亲的骨灰盒，不要那么多字。我就删掉一些话，剩下一段讲他经历的文字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删去了“批邓”的那些话。做成一个骨灰盒的盖子，上面写这么一篇，等到烧好了，就刻上去了，不久“四人帮”就垮台了。我说：幸亏我自己做主，把那段“批邓”的话删掉了；不然，我不是还要重新做过吗？我父亲没有能够看到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，也没能看到“四人帮”的垮台。他逝世之后，悼词里还塞进了一段“批邓”的话。但是，我作为子女、家属，自作主张，把这段话删掉了。我父亲晚年心中总想着邓小平，不仅因为是老朋友，而且因为

当时邓小平身系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社会主义的安危。所以我父亲关心这件事，没有看到粉碎“四人帮”、邓小平复出，我想，他在天之灵还是很遗憾的。

后来，虽然我与邓小平有一些近距离接触，不大的场合，就几个人的场合的接触，但是都是谈正事，比如起草他的什么讲话，或者起草好了，念一念给他听。这都是很正规的事，而且还有别的人在，并不是只有我与邓小平在一起，可以闲谈别的事情。所以，我没有向邓小平讲过我是他的老朋友龚饮冰的儿子。有几次场合，我都没有讲。一是我觉得这种场合不好讲；一是我的观念中，不愿意拿这种事情对他作一种特别的表示，比如希望他挂念啊、关照啊，我觉得都不合适。我就是个干部，这个工作要做，我都做了，该怎么汇报怎么汇报，该改什么文件改什么文件，散会就走了。我没有对他谈过父亲，但是有没有人给他介绍过，我不敢说。胡乔木领导我工作多年。有一次他带着我到叶剑英家里去，也是搞一个什么文件。乔木介绍说：这是龚饮冰的公子。叶剑英当然也知道我父亲。乔木是否向邓小平介绍过，我不知道。我接触他都是一些工作的机会，也不便于谈这些事。本来我有一次机会，就是前面说的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编完之后，他要找我们去照相。这是一个闲谈的场合，也许可以跟他谈谈。但是我失去了这个机会。毛毛写的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写到百色起义，讲到我父亲陪着邓小平去。但是，毛毛是否知道我与龚饮冰是父子关系，我也不知道。

曾：在您早年成长的过程中，您没有太多机会与您父亲在一起。后来您又在中央机关工作，长期参加中共中央文件的起草。在这样一个过程中，这样一位父亲对您有什么影响呢？

龚：1948年我到上海去，知道他的身份了，他是一位共产党员，是一位老革命，我当时是倾向于革命的。如果我父亲是个资本家，是个反革命，那关系就复杂了。他不但不是资本家，而且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，是个老革命，我感觉当然亲近，就没有一个（下转第127页）

方意识，曾含有不同或排斥日本异族的意思，后来又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的，只是到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才被逐渐演变成“台湾主体意识”和“台湾主权独立意识”，从而变成了不仅反国民党，也反共产党，反大陆，反两岸统一，大搞“去中国化”。这自然是一种“质变”。

苏教授在谈到台湾选举时说：“虽然陈水扁反复强调‘台湾主体意识’，攫夺选举时站在台湾这一边的发言权，试图将国民推向中国那一边’；‘台湾主体意识’不过是在选举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政治诈骗口号或手段，却从不见过程有任何‘台湾主体意识’的深论与具体内容。”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话。无论是“台湾主体意识”，还是“台湾主权独立意识”，陈水扁等主要还只是借以作为一种选举或政治斗争工具。一切是为了抢选票，抢政权，有选票就能上台，上了台就能搞钱，至于人民的利益，人民的福祉，上台后就全忘了。

直到目前为止，台湾的“主体性”和“主权独立”一类话，在民众中还是颇有欺骗性的。苏教授提出：大陆在这个议题上，“如何在‘和平发展、解放思想’的新思路下加以诠释”，是很多人所“关注”的。这对笔者很有启发。关于台湾“主权独立”问题，胡锦涛同志回答得已经很清楚，那是“主权和领土再造”，是“台独”，是不能允许的。至于台湾“主体性”问题，我看只能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“主体性”，而脱离一个中国的所谓“主体性”，那就是“台独”，同样是必须坚决反对的。

总之，我看了苏嘉宏教授这本书，受益良多。苏教授年轻，又是本土人，至少有“人和、地利”优势，得天独厚，愿能在两岸关系上有更多的著述和奉献。

（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 
资深研究员 北京 100081）

（责任编辑 刘学礼）

（上接第 92 页）要冲破家庭、参加革命的问题，他是支持我参加革命的。这都没有问题。

后来，我也没有想到，北平那么快就解放了。解放后，我父亲随着中央到了北京。当然他工作很忙，陪同刘少奇到天津考察，南下到丹阳准备接管上海。他是接管上海财经委员会的几个负责人之一，后来派他接管中国银行，新中国成立后又当轻工业部党组书记、副部长。他都是在领导岗位上，一直很忙碌。我与他有机会接触，但他很忙碌，没有功夫对我细谈什么东西，就是一些生活接触。当然，我非常尊敬他。后来，他身体慢慢不好，不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了。我那时候工作很忙，每个星期，不一定每个星期吧，去看看他。我的儿子还放在他那里，但也没有很多交流的机会。他不谈自己的过去，偶尔露一两句，但不多谈。这是他们做地下工作的习惯，都不谈这些问题。当时党内也没有写回忆录这个习惯，认为写回忆录都是吹嘘自己，共产党员谁写这个啊。所以他

也没有对我谈过什么历史。我当时也没有这个意识，没有找他谈，他也没有写什么回忆录。我作为他的儿子，又做思想理论工作，文字方面也还有点经验，我若去跟他谈，谈他的历史，可以帮他整理出一部回忆录来。我失去了这个机会，没有从他那里听到多少系统的故事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。

后来有人编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让我写一个我父亲的传，我感觉很困难。因为我没法讲得很具体，看他的档案，也非常简单。我通过自己的记忆，通过别人文章中提到过我父亲的情况，尽量搜罗，这才写了一篇大概一万多字不到两万字的文章，收在《中共党史人物传》里。其中，我亲身经历的、亲耳听到的很少，而我在别材料中搜集起来的，比较多一点。算是为他写了一篇简单的传记。

（责任编辑 王素莉）